

危机应对、物资流动、财政刺激、信息共享等方面，美国几乎都处于缺席状态，就连自己也成了疫情的“震中”，不仅没有发挥全球性主导作用，而且以邻为壑，对其他国家的抗疫努力妄加指责。就连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次疫情表明，美国未能调整战略以适应这个新世界”，“由于美国政府的狭隘自私与无能为力，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

际领导者”，“在这场领导力测试中，美国‘挂科’了，世界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糟糕”。

总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美国开始从全球领导国的神坛跌落，逐渐向一个普通的民族主义国家转变。所不同的是，美国在仍然拥有独一无二实力的情况下抛弃其长期承担的责任，这使得世界正在陷入一些学者所说

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即无力负责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在各种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长期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却“卸责护霸”，实施一系列颠覆性的内外政策，正造成广泛深远的国内外消极影响。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大变局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sup>[7]</sup>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所长、研究员）

## 周边格局的百年：从瓦解到复兴

文 / 钟飞腾

百年大变局的首要问题是历史定位。以大变局框架审视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则更富有历史意蕴。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依据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早在19世纪后期，伴随一批国家的崛起，中国政治家也提出过大变局的观点。但是，两种类型的国家崛起带给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思考百年大变局，除了经济总量指标之外，还需要更多更富有内涵和实质含义的新因素。对于大国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水平比经济总量更加重要，因为前者从真正意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意味着工业化水平发展程度，进而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逐步达到治理水平的提升。

### 朝贡秩序的瓦解

在第一个“百年大变局”中，

中国由强盛转向衰落。19世纪后期，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在走崛起之路，他们要挑战的主要是英国，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波及传统区域，导致不少旧帝国的瓦解。中国不幸也是如此，王朝解体，朝贡秩序崩溃，周边被切割成碎片，组成不同的阵营。

从人均收入看，100多年前的中国不仅极落后于西欧列强，也大大落后于邻国。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数据显示，1900年，中国人均GDP为540国际元（Geary-Khamis Dollar，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的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约为美国的16.2%；1913年，中国人均GDP为552国际元，约为美国10.4%；1929年，中国人均GDP为562国际元，约为美国的8.0%。1890年日本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国际元，1929年首次超过2000国际元。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

叶，一些原本属于朝贡秩序圈覆盖的国家，已经比中国发展得好。例如，1913年，在东亚各经济体中，只有尼泊尔的人均GDP低于中国。1929年，只有中国、印度和泰国的人均GDP低于1000国际元，其他经济体的人均GDP均在1000国际元以上。

二战期间亚洲国家深受战争伤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下滑，一度停滞。1913年，东亚16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678国际元，东亚30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752国际元。然而到了近40年之后的1950年，东亚16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666国际元，东亚30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710国际元。在麦迪森的统计分类中，“东亚”范围较广，实际上覆盖了中国的周边大部分地区，以人均GDP衡量，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周边“失去的40年”，两次世界大战对“失去的40年”负主要责任。

## 中国复兴与亚洲崛起

在第二个“百年大变局”中，一批发展中国家相继崛起，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中国全面走向复兴的前景变得明朗，周边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再度发生转变，中国重新成为推动周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百年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一个与中国关系更加紧密的周边正在回归。

经济增长率被认为是判断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最为重要的指标。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2%，另外一个重要参考值是截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最近一轮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数据显示，1984~2007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略高于3.2%，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3.8%。

以市场汇率衡量，2018年周边经济体中排名前12的国家合计占周边经济体总量的97.2%。其中，前六大经济体——日本、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合计占比为84.5%。按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中国周边经济体总量达到13.3万亿美元，比21世纪初翻了一番多。从经济增速来看，2018年中国周边经济增速为4.3%，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整体增速。尤其突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速仍高于周边经济增速两个百分点，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得益于两个出口高速增长时期，1986~1998年出口年均增速达到11.2%，



2019年11月4日，第3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在曼谷闭幕，泰国总理巴育致闭幕词。

2002~2007年年均增速为17.3%。推动形成这两个阶段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985年美国欲改善国内收支不平衡状况主导签署《广场协议》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两个阶段中，亚洲新兴市场出口目的地主要是欧美发达市场。IMF数据表明，1984~2011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为6.3%；而2012~2022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只有3.6%。这意味着全球贸易扩张速度无法满足亚洲的出口需求，亚洲必须加强地区一体化建设，提升区域内消费市场的发展能力。

在第一个百年变局中瓦解的周边秩序，经过一个世纪的变化，目前似乎正在变得更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之一主要来自中国本身的复兴，中国重新成为周边经济增长的

动力源。特别是最近20年的历史表明，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助于周边经济体抵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高速的经济增长，也给周边带来了巨大红利。中国正在迅速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采取了诸多有利于团结周边国家、夯实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举措，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快速协调组织周边国家召开抗疫会议，并向周边多个国家派出医疗队。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百年大变局加速发展。4月3日，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2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只有2.2%，而去年9月估计值为5.5%。IMF也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急剧跌入负增长，出现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因此，新冠疫情对亚洲经济的冲击远远超过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不过，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如果疫情早日结束，ABD预计2021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将反弹至6.2%，这意味着亚洲经济体仍具备超强的经济复苏能力。

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占全球四分之三，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受到更大的冲击，因而将进一步缩小与发展中经济力量的对比。抗击新冠疫情考验一个国家的

治理能力，如果中国率先步入后疫情时代，将更能引领周边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 中国在“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定位

文/魏玲

“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的变化。随着综合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世界定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将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要理解这些变化和影响，我们需要探讨三个问题。首先，中国的世界定位究竟是什么？其次，大国地位追求的策略一般有哪些？最后，大变局形势下，中国的地位追求和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追求之间如何协调？中国外交该如何作为？

### 在变化中寻找定位

要确定中国的世界定位，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我们身处的世界，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对中国世界定位的探讨，是将西方主导构建的战后国际体系作为恒定不变的参照系。相对于这样一个体系，中国先后被界定为游离于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国家、逐步融入体系的维持现状国家和深度参与体系互动的利益攸关方。近年来，中国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持续提升，共

建“一带一路”等全方位外交积极开展，对既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制度体系构成了冲击。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实力和海外利益不断增长，但又不认同西方模式和发展道路，因此势必要挑战美国霸权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难以实现和平崛起。

这个逻辑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体系本身的变化。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意涵是世界本身在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方自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出了问题，治理失灵现象频发，全球化进程发生了逆转，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国际制度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二是世界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包括多元行为体、多元文化、多元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霸权思维和极化思维逐渐失去合法性。“G0”概念，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有能力、有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经济议程，它的提出说明未来由某种单一模式或者一两个大国主导世界可能是行不通的。三是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最近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凸显了流行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冲击。疫情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病毒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正如崔天凯大使4月3日接受美国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采访时所说的，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的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全球化时代，自然灾害、流行病、气候变暖、核扩散、经济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各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敌我思维和对抗思维将导致双输，甚至满盘皆输、体系崩溃的结局。面临上述体系变化，合作进化应成为愈加彰显的行动逻辑。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成员要通过多元平等协商争取最大程度的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维护世界稳定、发展与可持续。

在变化的世界和国际体系中，关于中国的定位是什么？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的战略判断和论述，指明了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从国际地位上看，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引